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学联合”项目

七位农民的生活

朱永新 沈淼 等译

苏州大学出版社

亚洲

稻农

RICE

IN ASIA

D423. 07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学联合”项目

七位农民的生活

朱永新 沈 淼 等译

苏州大学出版社

亚洲 稻 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亚洲稻农：七位农民的生活/新加坡 AMIC 编；朱永新等译. —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 1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学联合”项目
ISBN 7-81090-072-2

I. 亚… II. ①新…②朱… III. 农民—生活—状况—调查研究—亚洲 IV. D423.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3667 号

Copyright © 2000 by Asian Media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Centre.

This Chinese Version Copyright © 2003 by Suzhou University Press.

登记号 图字：10—2003—134 号

亚洲稻农——七位农民的生活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学联合”项目

朱永新 沈 淼等译

责任编辑 朱坤泉 何其捷

苏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苏州市干将东路 200 号 邮编：215021)

丹阳教育印刷厂印装

(地址：丹阳市西门外 邮编：212300)

开本 787×1092 1/16 印张 18 插页 14 字数 422 千

2003 年 12 月第 1 版 200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1300 册

ISBN 7-81090-072-2/D·17 定价：50.00 元

苏州大学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本社负责调换

苏州大学出版社营销部 电话：0512-67258835

译者序

1995年,为了在各领域内鼓励和促进世界各国大学间的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高等教育部发起了一项名为“大学联合”(UNIVERSITY TWINNING)的活动。PRELUDE是“大学发展地区电子教学辅助产品”的英文首字母的缩写,1997年,它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可为“大学联合”活动的一部分。《亚洲稻农》是PRELUDE的第一个主题项目的成果。该项目始于1997年5月,终于2000年10月,历时三年多。来自亚洲七个国家的学者参与了该项调查活动。

随着近年来社会学研究的飞速发展,现有大学的社会学教材与读物已远远不能满足教学和师生们阅读的需要。《亚洲稻农》以其多文化、跨学科、内容丰富以及语言优美通俗等特点,从众多社会学专著中脱颖而出。它通过对亚洲各国稻农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的描绘,向我们展示了一幅生动的社会生活画卷。本书不仅是社会学系学生不可多得的读本,同时也将使主修农学、人类学以及新闻传播学等学科的学生从中受益。正是本着这一初衷,我们与本书的版权方——亚洲传媒信息和交流中心(简称AMIC)进行了磋商,并于2002年2月签订了《亚洲稻农》的翻译协议。

本书的翻译工作于2002年5月正式开始,经过翻译组所有成员的不懈努力,于2003年1月基本完成。这期间,所有的译稿都经过了多轮的校对和文本的重新编辑。

PRELUDE调查项目中国地区负责人、《亚洲稻农》英文版中国苏州篇的作者、苏州大学朱永新教授担任本次翻译工作的总负责人。他的研究生沈森任翻译组的主译和协调人,负责协调翻译组内的事务以及与亚洲传媒信息和交流中心的联系事宜。各章的译者分别是:前言和序言虞兰洁、沈森,第一章李瑾,第二章束妍敏、沈森,第三章葛存根,第四章杨娟,第五章王怿旦、张雪梅,第六章刘婷婷、严晔,第七章邵爱国。朱永新教授和沈森完成了译文的统稿工作,陈富军、穆彦均、王红蕾等同志给予了许多具体的帮助。

这里我们要特别感谢苏州大学出版社的朱坤泉和何其捷两位编辑,感谢他们在审稿过程中对译文进行的缜密细致的审稿加工,并给我们的翻译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改意见。没有他们,译

● ● ● ● ● 译者序

书的出版不可能如此顺利和迅速。亚洲传媒信息和交流中心为本书的翻译和出版提供了资助,在此也谨向他们表达我们的谢意。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尽可能保持英文原版的风格,除少部分内容有所删改外,基本做到了忠实于原文。但由于我们能力所限,译文中尚有一些不太完善的地方,恳请识者指正,以期修订再版。

译者

2003年3月

前言

1995年,为了在各领域内鼓励和促进国际各大学间的合作,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高等教育部发起了一项名为“大学联合”(“UNITWIN”或称“UNIVERSITY TWINNING”)的活动。PRELUDE是“大学发展地区电子教学辅助产品”的英文首字母的缩写,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式认可其为“大学联合”活动的一部分。PRELUDE活动的成果——本书及与之配套的教学光盘(CD-ROM),将可能成为“UNITWIN”项目下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认可的第一项物质成果。这些成果将使亚洲的学术界从中受益,尤其是对于那些主修社会学、人类学、农学以及传媒课程的大学生来说,更是会从中受益匪浅。

“亚洲稻农”是PRELUDE的第一个主题项目。该项目调查并记录了大量对稻农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的重大事件。此项调查,无论是对那些从事政策制定、艺术创作或文化传媒行业的人来说,还是对那些长期致力于研究奇闻轶事的人来说,都能提供大量丰富的素材和资料。

水稻是一个全球性的话题。全世界有20多亿人食用大米;这些大米的90%产自亚洲,并被亚洲人所消费。现在至2025年,预计还会增加14亿的大米消费者。因此,全面了解影响水稻产量、稻农生活及其社会各方力量之间的内在联系是非常必要的。

对于亚洲人来说,水稻不仅仅是食物,它还塑造了农村生活中的习俗、文化、政治和经济。这种不可或缺的作物,在某种意义上,还决定了某些亚洲国家的生存和发展。

PRELUDE这本书的内容也远远不止于对水稻和稻农生活的描述,它还强调:在农业现代化的脚步悄悄逼近的时候,农民在处

理其自身与土地、家庭以及社区的关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此书还描述了对农民的价值观、期望和未来有着重要影响的农业种植的动力。

加东秀枋博士,PRELUDE项目的国际协调员,对这一历时三年的项目进行了规划,并确定由日本财团作为其赞助商,资助整个调查过程。活动还得到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富士通(新加坡)公司、卡西欧(新加坡)公司以及日本名古屋中部大学的大力支持。

亚洲传媒信息和交流中心(AMIC)担任了项目秘书一职,为项目的国际协调员及研究员提供行政和后勤方面的支持,并四处牵线、联系本书及其配套的教学光盘的出版事宜;此外,还创建了PRELUDE网站,且一直负责网站的维护工作。

有九位亚洲学者入选、参与了此项调查活动,他们分别来自中国、印度尼西亚、日本、韩国、马来西亚、菲律宾及泰国。他们在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语言学及民俗学上的造诣充分反映了此项调查多文化视角的特点。项目刚开始时,在加东博士的提议下,研究者们打算以个人传记的形式来编写各自负责的章节;但最后,他们决定根据各自的专长、学术背景和调研的方向,采取了更适合自己的编写方法。

此项调查于1997年5月正式开始。在新加坡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加东博士和研究者们讨论了项目开展的具体方法、活动安排以及项目结束的时间。第一年为探索期,主要是确定研究的对象——农民和最初实地调查的地点。第二年为调研巩固期。在最初的两年中,学者们共同举办了四次研讨会,回顾这两年的调研活动,并就实地调研的困难及其对策进行了探讨。这四次会议分别在中国、日本、新加坡和泰国召开。与会期间,研究者们还抽空拜访了参与该调研活动的农民,并参观了他们的农田。1999年整个一年时间都用于重要资料的核实和各章节的撰写工作;同期进行的还有教科书和教学光盘中图片和视听材料的收集工作。

秘书处还为PRELUDE活动创建了一个专门的网站(www.amic.org.sg/PRELUDE/),旨在向对本次调研活动感兴趣的各方人士介绍该活动,并给项目参与者提供一个相互交流意见的论坛,同时还加入了反馈功能,以便收集广大读者的反馈意见和建议。

调查活动的结果最初基本上都是用各位学者的母语编写成的。因为英语是便于项目参与者交流以及教科书和教学光盘编写的官方语言,因此这些初稿最终还要翻译成英文以便出版。这期间,所有的手稿都经过了多次审定和重新编辑,并于2000年10月最终完稿。本书定于2000年12月第一版印刷,而教学光盘数据库的建立及其制作则历时2000年整个一年的时间。

与水稻生产一样,本书也是多方合作的结果。众多个人及团体的支持和参与确保了此项活动最终获得成功。在这些人当中,包括国际协调员、日本中部大学高级研究部的加东秀枥博士,中国苏州大学的朱永新博士、龚毅先生和潘新玉女士,印度尼西亚大学的加米拉·苏曼特里博士,日本冈山县冈山市大学的高桥粕尾博士,马来西亚Putra大学的缪萨·阿布·汉森博士和巴哈曼·阿布·萨曼博士,菲律宾大学的克莱曼·克鲁兹·埃克农博士,韩国全罗南大学的宋纳昆博士以及泰国清迈大学的凯沃特·卢戈朗格斯博士。

这里我们还要感谢本项目的赞助商——日本财团的大力支持,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此次调研活动的成果可能还不能公诸于世。在此,我谨代表整个项目组成员分别向基金会主席埃亚克·索农女士和总裁余平隼川先生,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基金会同仁致以衷心的感谢。同时,我们还要感谢日本名古屋的中部大学,感谢他们在项目研究的初期阶段给予我们的热心帮助。

富士通(新加坡)公司为项目组提供了笔记本电脑,卡西欧(新加坡)公司也为项目研究员和秘书处提供了数码相机,在此我们也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我们还要感谢以下人员:南洋理工大学传媒学院的约瑟夫·苏麻威尔博士,他担任

了教学光盘的图片编辑和顾问一职,还提供了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等国的照片,给予了本次活动可贵的帮助;美国休斯敦 Baptist 大学传媒学院的玛丽亚·美特尔博士以及凯威瑟·雪缇女士参与了手稿的编辑;新加坡国立大学社会学院的塞林娜·陈博士和印度自由撰稿人、作家及农业顾问 G. 温卡特莱曼先生以读者的身份对手稿提出了宝贵的修改建议;美国哈里斯堡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的塞米尔·温克博士在中国及韩国拍摄了很多珍贵的照片资料,丰富了教学光盘的内容;曼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王一冰博士也向本项目提供了他独到、深刻的见解。

我们还要向设在亚洲传媒信息和交流中心的 PRELUDE 秘书处表达我们诚挚的谢意,他们的承诺及耐心为我们能在预定期限内完成调研活动提供了保证;他们还在我们遇到困难时认真听取我们的反映并协助解决了困难。秘书处成员包括:伟杰·曼侬先生、威格尼斯温瑞·高雯黛萨米女士、瑞萨·布莱克里夏女士、乔治·谭先生、列维·A. 龚先生和琼斯·马利亚·卡洛斯女士。

最后但却是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要将最诚挚的谢意献给本书所描述的稻农们,他们是:中国的顾梅生、印度尼西亚的曼·欧勒、日本的小林新内、马来西亚的塞弗·巴哈瑞·艾兹、菲律宾的娜·翠宁、韩国的宋秉善、泰国的塔库姆以及他们的家人和所在的社区。同时,我们也要感谢他们在本次研究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耐心、合作和极大的热情。

目录

序言	(1)
第一章 一位中国苏州农民的生活	(17)
第二章 变化的村庄:关于印尼稻农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的个案分析	(49)
第三章 案例研究:一位大步向前的日本稻农	(77)
第四章 一位韩国稻农的人生经历	(115)
第五章 巴哈瑞:一位进取创新的马来西亚稻农	(153)
第六章 人生旅途中的稻米种植:来自菲律宾一个村庄的故事	(187)
第七章 泰国北部的一个稻农家庭	(239)



序 言



加东秀枊

- 第一节 背景
- 第二节 水稻文化的历史
- 第三节 水稻与人
- 第四节 家庭、邻里和社区
- 第五节 生产与消费
- 第六节 水稻与宗教
- 第七节 现代化的影响
- 第八节 展望未来



时表对照

辛巳	廿一
壬午	廿二
癸未	廿三
甲申	廿四
乙酉	廿五
丙戌	廿六
丁亥	廿七
戊子	廿八

第一节 背景

本书所描述的人物有：顾梅生、曼·欧勒、小林新内、宋秉善、巴哈瑞、娜·翠宁、塔库姆以及他们的家人和邻居^①。这些人物彼此间并不认识，他们所处的地理位置也相距甚远。例如，如果宋秉善有机会去和曼·欧勒碰面的话，他必须乘飞机从汉城飞到雅加达才行。多亏了有现代交通工具，即使是5000公里以上的路程，也只需要几个小时就能到达。曼·欧勒、巴哈瑞、娜·翠宁和塔库姆都生活在热带地区，他们不知道严寒是什么；而顾梅生、小林新内和宋秉善在11月至来年3月间寒风凛冽的夜晚，却需要依靠取暖装置来保持身体和室内的温暖。除了曼·欧勒和巴哈瑞有共同的语言——马来印度尼西亚语外，其余的人母语都不尽相同。顾梅生所在的是社会主义国家，而小林新内却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生活。娜·翠宁笃信天主教，而塔库姆却时常去寺庙诵经拜佛。就连他们各自所谓的“新年”指的都是不是同一天。小林新内和娜·翠宁庆祝的是公历的新年，顾梅生和宋秉善过的却是中国阴历的春节。对塔库姆来说，他的新年是遵循佛教教历而定的那一天，而曼·欧勒和巴哈瑞所过的新年则是由穆斯林教历决定的。对于宋秉善来说，与银行以及其他金融机构往来是每天生活的一部分，而曼·欧勒则喜欢将积蓄换成黄金储存下来。他们所受的教育程度也不同：小林新内和宋秉善都有过境外旅游的经验，而顾梅生却连离他家乡很近的大都市——上海都不愿意去。

尽管他们之间似乎差距很大，可他们却有着一个极其重要的相似点——职业，即他们都是农民。他们中除了塔库姆最近改为种植洋葱外，其余六个人大部分的时候都是在田间种植水稻。更重要的一点是，尽管分布于各个不同的地方，他们都生活在东亚和东南亚。他们属于同一人种，有着相近的文化传统。从政治和经济的角度来看，他们又都居住于东南亚国家联盟以及中国、日本和韩国境内，他们同亚洲其他上亿的农民一起，为满足所在地区人民的粮食需求，几个世纪来一直从事水稻种植事业。如果没有这些稻农的辛勤耕作，我们这些居住在该地区的人就无法生存。一碗米饭，是我们每日每餐都要看见并要消耗的最平常的东西，却是稻农们汗水和努力的结晶。

这七位农民分别由该国的研究员采访和研究，调查是从1997夏季开始的，经过了1998年的春天，直到1999年夏末才结束。农民们向这些研究员讲述了他们自己的一些精彩故事，每个故事都极具教育意义。本书真实地记录了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各种喜怒哀乐的情感。研究者们定期去农民那里访谈并记录他们的故事，他们对农民的描述也不尽相同，因为研究者各自的专长不同，且所在国的条件也存在差异；但在与农民交谈的过程中，研究者们都遵循“参与观察”的方法来展开各自的研究工作。本书旨在讲述这七个国家的农民如何种植水稻，农民的日常生活如何。本次调查的目的则在于加强亚洲大学生之间的信息交流和相互理解。

如前言所述，该国际性项目是大学联合（UNITWIN）活动的产物，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的鼓励和授权，不仅仅是为了促进各大学间的合作，更是为了加强不同国家

人民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因此,本书旨在在大学生之间传播和交流信息,并使亚洲地区的读者通过他们最熟悉不过的水稻,来了解他们近邻的生活。在西欧,继欧盟出现后,就由各国的学者共同协力编撰了《欧洲史》,其目的就在于提升欧盟中各民族间的了解程度。在亚洲,由于我们长期变动和复杂的历史,进行《亚洲史》的编撰工作时机一直不成熟。因此,在现阶段选择“水稻”这个政治上中立且又大众化的话题来展开《亚洲史》的编撰工作不仅是必需的,也是明智的。我们希望通过本书让更多的亚洲青年来彼此相互了解,并由此开始关于“亚洲人自我统一性”线索的寻找。参与本项研究的人员都是资深学者,都是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的委员会指派或由权威的资深学者举荐的。

第二节 水稻文化的历史

虽然水稻的起源尚未最终确定,业界中却早就存在着几种假设性的理论。根据最近的考古学及人类学研究的结果,水稻农业的专业人士发现水稻的诞生地可能是阿萨姆邦高地(印度东北部)和云南(中国的西南部)。简而言之,水稻的诞生地是在现在中印边界一带的某个地方。我们知道早在公元前 7000 年的时候,该地区就已经开始了水稻的种植。那时,粮食一般种植在干燥的山边,而不是潮湿的水稻田里。今天,我们已经完全将水稻种植与稻田联系在一起,因此当面对住在泰国北部、老挝、越南、中国西南及所有亚洲国家的高山地区的“高山族”将水稻种植在高地上的事实时,我们不免会感到惊讶万分。

对水稻史前史的理解可以通过对现代水稻发展背景的考察来获得。从生物学的角度,可以将水稻理解为是从一种叫欧瑞兹(*oryza*)的植物或野生水稻演变而来的,它和稷、德干草及其他黍同属一科。在远古的时候,这些谷类间还没有区分。现代水稻,则是人类几千年发明创造的产物。事实上,其他的黍米在水稻种植的地区仍有小规模种植。当今,在泰国的北部、日本的高山地区,人们仍在种植并食用黍米。因此,在众多的原始野生品种中,水稻已渐渐成为主要的种类,并在亚洲传播开来。

但是,谷物的种类仍旧是丰富多彩的。总的说来,水稻可分为两种:一种是印度种(*Indica*,长而干的谷物),另一种是日本种(*Japonica*,短而糯的谷物)。日本种又可以进一步分为糯型和不糯型。这些相异性不仅体现在水稻的食用习惯上,还表现在乡间的民俗上。举个例子来说,在中国南部的云南省,当地人用糯米蒸熟来招待客人;而在泰国的北部,当地居民则用红糯米来庆祝节日庆典。总的来说,亚洲各地区食用大米是存在差异的。在现今的日本,消费者相对比较注重大米的品牌。在东京的米店买米的居民一定要仔细查看大米的产地、种类和包装,并在经过一番精心比较后才着手购买。这种精心的挑选不亚于他们对美酒的选购。水稻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处在不停的变化之中,而其历经几百年的传播过程也是很值得费心研究的。

水稻的第一次传播发生在湄公河、昭披耶河(湄南河)(*ChaoPhraya, Mae Nam*)及其他河流的两岸。实际上,这些河流也都是大运河,这些运河不仅在农业技术方面,还在文化的传播方面连接了亚洲的高山地区和印度支那半岛富足的平原地带。这些传播是伴随当

时人口的迁移而产生的。这些沿河贸易直到今天仍很频繁,其中还包括了臭名昭著的“金三角”。通过这些河流运送到印度尼西亚去的水稻是现在称之为“日本种”的短而糯的品种,这种水稻只能种植于内陆地区。

水稻的第二次传播是在西南方向。稻种从阿萨姆邦高地,通过与恒河汇合、贯穿孟加拉大盆地的雅鲁藏布江,传播到了印度次大陆上。通过这条路线传播的稻种是长而干的印度种。据专家们推测,传播到东印度的稻种又进一步向东传播,直达从加尔各答到金奈(Chennai)的印度次大陆的东高止山脉,再往东继续传播,穿过了孟加拉海湾,可能还传到了马来半岛、印度尼西亚和印度支那海岸线。这个假设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种会成为泰国南部、老挝、柬埔寨和越南地区耕种的主要稻种。为了方便起见,我们暂时称之为“孟加拉路线支线”。传播到东南亚的水稻又通过印度尼西亚群岛这条路线,继续传播到了菲律宾,而后又传到了中国台湾和日本。换句话说,东南亚或是现在的东南亚国家联盟的成员国的“水稻文化”无一不受到印度国和印度种的深刻影响(北部高原地区少数种植日本种的地区除外)。

水稻传播的第三条路线是“孟加拉路线”的另一条支线,它横贯喜马拉雅山南面的内陆平原带。它与上面提到的支线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这里种植的水稻是日本种,而非印度种。这就表明水稻不是一种生物稻种。事实上,专家们认为世界上最少有80种不同的水稻。为方便起见,特将它们分为三个亚种,分别为印度种、日本种和爪哇种(一种仅限于印度尼西亚境内某地区种植的水稻)。

水稻传播的第四个方向是从阿萨姆邦—云南地区向东传播。从地图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该地区正是湄公河和恒河的发源地,同时,它也是扬子江(长江)的源头。扬子江浩浩荡荡从云南奔向上海,途经重庆、武汉、南京等中国中部的城市。这条“扬子江路线”是水稻输送到东亚的又一条重要通道,其输送的水稻种类主要是日本种,而且这一带的水稻种植一向比较兴盛。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该地区的水稻产量占世界水稻总产量的三分之一。传播到中国的稻种而后又继续传播到了朝鲜半岛和日本。日本是这个地区最后一个开始种植水稻的国家——日本的第一批水稻种于公元前100年。因为日本位于东亚的最北面,很难种植水稻这种亚热带作物。基于这个原因,最初传到日本的爪哇种难以适应那里的环境而最终被当地人所放弃,而改种米粒短而圆的日本种。18世纪以来,日本的水稻就主要生长于日本国的北部亚寒带地区。

水稻文化传播的一个重要结果就是,这些地区的人民都成为水稻的生产者和消费者。实际上,截至1995年底,这里有约15亿的人口(占当时世界人口总数的30%)食用水稻,本书所描述的七位农民就是在这样的大环境下生活和劳作的。曼·欧勒、巴哈瑞和娜·翠宁就是“恒河路线”所经地农夫的后裔;顾梅生、宋秉善、小林新内则是“扬子江路线”所经地农夫的后裔;塔库姆的所在地却有些特殊,它处于离水稻诞生地最近的地方,即“湄公河路线”和“恒河路线”的交汇处。东亚以及东南亚的水稻文化与印度半岛和西亚的不同,同时也异于在沿“恒河路线”和“喜马拉雅山路线”传播的过程中与“小麦文化”融合后所形成的新水稻文化。这里的居民一直都将水稻视为维持日常生活的主要食物种类。

第三节 水稻与人

亚洲水稻的价值可以在众多的历史纪录以及在作物地区间流动的事实和数据中得到证实。举例来说,1996年,当日本因一场意外的干旱而陷入了粮食短缺的困境时,日本政府毫不犹豫地决定从泰国进口大米。1997年,印度尼西亚不得不向其邻国进口大米,其中相当一部分是来自外国的紧急救援。北朝鲜由于在该地区相对孤立,在经历了一段长期的粮食短缺后,最终导致了饥荒。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东(南)亚的国家和地区就开始互伸援手,曾是大米出口地的中国台湾现已开始从其他国家和地区进口大米。另一方面,到1999年,泰国、越南、老挝和缅甸已成为主要的粮食出口国。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粮食出口地和进口地基本上都在我们所说的同一区域。区域外的粮食贸易几乎是不存在的,尽管北美和澳大利亚正竭力试图通过世贸组织向亚洲地区出口粮食。换句话说,亚洲地区的粮食已经或者正在趋于自给自足。

而且,因为水稻本身的特性和各民族居民的需求,水稻不仅在文化领域,而且在政治领域中也一直占据着重要地位。例如,当日本粘稻种最初打入印度尼西亚市场时,当地的居民并不太喜欢这一品种。印度种在东京的少数民族(东南亚人)餐馆里备受推崇,但当它出现在普通家庭的饭桌上时,大多数人对这种进口大米并没有太大的好感。事实上,日本公共机构甚至不得不向公众传授如何在家用的饭煲里蒸煮这种长粒大米的方法。

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各个地区的米价也不尽相同。比如,韩国的米价就是马来西亚米价的四倍。但是,公众的口味以及政府的政策,都或多或少地使水稻的生产和分配得到了些保护。在本书所描述的七个国家里,民众们普遍都明白这样一个道理:米是一个国家和地区为数不多的必须能自给自足的产品之一。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北美和澳大利亚想通过世贸组织来实现向亚洲自由出口粮食的愿望,可当地政府,尤其是被视为主要进口国的日本,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并决定向进口的大米征收非常高的关税。

工业品无国界,政府和公众都不会在意摩托车或冰箱的原产地。人们也不会在乎今天买的肉、鱼或蔬菜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但他们却经常会留意大米的原产地。大米种类和质量的差异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意义重大。大多数人的口味都倾向于“本国货”。

此外,与人类的另外两种主食——小麦和玉米又不同,大米基本上没有经过什么加工。水稻生来就该是收割后就被储藏起来,食用前再蒸煮一番,而且传统上人们也是这样做的。米粉在中国很少见,连米线也只是在中国的少数地方才有。对于亚洲的大部分居民来说,每餐食用的大米应该是蒸煮的。泰国的农民每天中午食用的都是隔夜的米饭,但是他们每天都要煮饭,只是煮好的饭总是要留到次日才吃。米越是新,口感就越好。当然米也可以储藏好几年,私人的和公共的“米仓”在泰国和日本都是很常见的。人们经常吃的都是有二三年历史的陈米,但一般人们都认为新收割的米的口感才是最好的。换言之,在亚洲地区,米是一种准新鲜的农产品,尽管它可以被储藏好几年。

更重要的是,在亚洲的很多地方,米都被作为“主食”食用。肉、鱼、蔬菜和其他食物

则常常被称为“副食”，即与“主食”搭配着吃的副食。例如，咖喱饭这种地区性的大众食物，就是先将蔬菜、鱼或肉一起放入锅，熬成很浓的汤，再将浓汤浇在一盘蒸好的饭上做成的。炒饭是大米饭的另外一种烧法，在中国海南风味的餐厅里、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的饭店中经常可以见到炒饭。炒饭的主要成分依旧是大米，只是添加了少许的海鲜和蔬菜。亚洲人 50% 的卡路里和营养都来源于大米。实际上，亚洲人只要有一碗饭和少量的诸如泡菜或调料等的副菜就可以生存。例如，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这种情况现在已经很少见了），韩国人只要有米饭和泡菜就可以了，泰国人只要有米饭和鱼子酱也就可以对付了。

如此看来，亚洲的饮食习惯与西方的就大相径庭了。西方人的主食是鱼或肉，小麦做成的面包只是他们的“副食”。当然了，历史上，“面包”在西方文化中有着深远的象征意义。可是，现在大多数人并没有察觉或意识到他们所吃的正是谷物中的碳水化合物。当然，地中海文化是个例外，那里意大利通心粉和米饭是人们的主食。事实上，食物学家指出，面包和火腿、腊肠、奶酪一样，都是食物的保存形式，但是诸如小麦、玉米、燕麦等谷类食品所产生的热量并不能够满足西方人对“主食”的要求。

因此，东亚人和东南亚人在相邻国度里旅游，相对而言是非常轻松的，因为在这两个地区，旅游者都可以找到自己喜爱的米饭。虽然各个地区的烹饪方法又有不同，但大米都是主食。正如前面所述，亚洲人都属于“食米族”，本书所描述的七位农民就是千万农民的代表，正是他们养活了这帮“食米族”。但值得注意的是，大米并非是该地区唯一的主食。早在远古时代，中国就记载有“五谷”的说法，所谓“五谷”，分别为稻、麦、玉米、高粱、大豆。这五谷就是农民主要种植的谷物，人们经常把它们和黍米混着吃。前面已提到，黍米直到现在仍是高山地区居民种植的主要作物之一。

第四节 家庭、邻里和社区

水稻的生长需要灌溉——这点我们将在后面详细讨论，因此通常需要开挖许多相通的沟渠，而这样的工程只有靠大家的齐心协力才能完成。但是，在全球的大多数村庄，粮食生产最基本的单位是家庭。实际上，在亚洲农村里，通常一对夫妇会生六七个小孩，因为对这些贫穷的农民来说，孩子就相当于劳力，孩子多就意味着劳力多，劳力多就意味着收获多，而且最重要的一点还是将来就更有保障。今天，每个家庭的孩子的数量都在减少，平均每户只有两到四个孩子。就拿顾梅生来说吧，子孙三代同住在一个屋檐下，不管孩子们离家多少次、离开多少年，家庭成员的关系都是非常紧密的。

对农民来说，家庭的重要性似乎总是处于他们价值体系的最顶层，家庭凝聚感总是处于他们生活的中心。宋秉善应该算是个改革派了，他购置了许多农业机器，借助这些机器，只需他一个人就可以完成播种、种植和收割的整套工作，但他仍然需要家庭的帮助。事实上，大多数亚洲人都来自农村，即使是现在居住于汉城或曼谷的上流社会的高级总裁，他们的父辈或祖父辈很可能也是农民。因此，宋秉善的亲戚每年从大城市回农村过年，也是很自然的。

东亚的家庭不仅具有现代色彩,还具有历史特色。他们现在耕种的土地是从祖先那里继承来的,稻田里仍留有祖先的遗迹。在韩国,每家都珍藏着自家的家族史,人们总是时刻牢记自己的宗谱。他们不管私有财产的多寡,总是将土地视为自己唯一的财产。农民们都有这么一个坚定的信念:绝不可以把自家的土地卖给他人,这是祖先生活的地方。

例如,距小林新内房子 150 米的地方已经成为日本交通局和当地农民二十多年协调的焦点,日本交通局想说服当地农民把土地卖给政府以建造东京国际机场的一个跑道。农民们断然拒绝了政府的要求,理由是,这方土地是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祖先的神灵就生活在这里。在日本,人们还普遍持有这样一个观念,墓碑属于一个家庭而不是个人。在日本的公墓,随处可以看到这样的碑文:“××家族之墓”,据说家族成员死后都葬在同一个墓碑下。

在其他地方,村里所有家庭的墓地都集中于一个地方,村里所有的居民都可以祭拜那里的墓碑。中国有句老话叫“落叶归根”。因此,自然地,生活在这里的农民的家庭纽带是极其坚韧的。本书所记载的七位农民也都表现了他们对家庭观念的高度重视,尽管现代化的水稻种植已不再像以往需要家里男性劳力的帮助,而是可以被现代农业机器所代替。

在这七位农民中,娜·翠宁的情况有些特殊。她是在丈夫去世后才开始管理种植的。在亚洲,农夫多是男性,他往往也是一家之主。但女性在种植管理方面,也负有很大的责任。娜·翠宁是一位勤恳且自信独立的女性。描述亚洲农民的作品,通常总是倾向于表现他们强硬、家长式的作风,尤其是在传统的乡村社区里。而娜·翠宁却向我们充分展现了亚洲女性的责任感和能力。虽然对几乎所有农民家庭来说,女性只是充当贤内助的角色,但实际上,家庭的各项活动都是由女性一手包办的。在塔库姆的家里,就是他妻子负责家庭的预算,每次需要钱的时候,他就向妻子拿。无独有偶,在小林新内家也是妻子掌管财务大权。与传统的亚洲农民家庭中总是父亲掌握绝对权力相比,现代亚洲的农民家庭相对而言显得就比较民主了些。

这一点在大众传媒时代显得更为突出。媒体给农民带来了新闻,并在他们中播下了新的价值观。本书所描述的七位农民家中都有电视,而且他们每天都要看电视。新闻使他们了解了当地以及世界其他地方新近发生的重大事件,这些都对农民的生活和思想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他们总是无意或有意地接受新价值观的影响。例如,尽管顾梅生本人不喜欢城市生活,但他也知道城市人的生活是怎样的。曼·欧勒曾经在城市生活过,有这方面的亲身体会,知晓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的差异,而且通过电视,他又一遍遍地体会到这些差异。那些旨在介绍夫妻之间、家长和孩子之间的新型关系的广告和教育节目,也对农民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震撼。电视就像一股现代化的动力,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农民的生活。

此外,教育力量的渗透,不仅包括初级教育,还包括了高等教育,构成了又一股现代化的动力,因为这股动力的产物——接受过良好教育的青年已成为农村家庭生活的革新者。被送到高等学府深造的孩子给他们的父辈们带来了新的科学技术和其他方面的知识,而这些知识又改变了农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尤其是在技术方面,年轻一代的能力显得格外突出。例如,一个学过生物学基础知识的农民会运用其所知识来改变农民的种植工